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

□ 徐春辉

张闻天一生执着于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青年学生时期即投身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加入党组织后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革命职业生涯中，他以求实的精神、优良的作风和实际的行动，展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光辉形象，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在真理面前始终坚持“说老实话”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他的父亲以勤劳能干闻名乡里，母亲是一个聪明果敢的女子，父母潜移默化地影响，使他养成了勤勉朴实、勇敢刚毅的品质。他尊重真理、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始终坚持“说老实话”。长征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他们经常讨论交换意见，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观点也都日趋一致，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问题上。因此，在遵义会议生死攸关时刻，张闻天毅然选择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抵达陕北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动逐步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毛泽东结合政治形势提出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以及“东渡黄河”“开辟山西北部”部署是正确的，因此对于这一决策，张闻天也明确表示赞同与支持毛泽东，并及时改变了自己原来准备“北上宁夏”的方案。当时有人对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凡事与毛泽东商量的一些做法不理解，认为他“老是跟着毛泽东跑”，而他总是十分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不但能做到服从真理，还常常以“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气概修正错误，生动诠释了一名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顽强意志。在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期间，张闻天常常以“思美”“斯勉”“歌特”等为笔名，在《红旗周报》《群众日报》《实话》等党的报刊上，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抨击错误的思想观念。遵义会议后，他以党内“负总的责任”的身份，更是旗帜鲜明倾力纠正“左”的军事路线错误，号召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之“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坚决反对完全脱离群众“以背诵共产主义的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为满足”的错误做法。

“深刻的了解群众心坎中所要求的与希望的”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张闻天深知，“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所以他经常号召共产党员把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

来，投身到千千万万群众中去“深刻的了解群众心坎中所要求的与希望的”，他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并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1942年为了了解群众、熟悉群众，张闻天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亲自带队从延安出发，先后在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开展全面深入的实地调研，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包括《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抗战胜利后，他又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实际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化名“张平之”到一个古老的小县城——宁安蹲点，当时的宁安虽然成立了中共宁安县总支部，但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张闻天到此之后，把大胆深入群众、进行剿匪斗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主要任务，用了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根据地。

关于深入群众，张闻天还结合工作实际及自己调查研究的经验，专门撰文《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出发归来记》等总结了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使群众最后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与口号”，他认为这是深入群众的一个重要目的。为此，首先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实际中求真知。在他看来，社会调查是深入群众的一个基本环节，这是一个简单、生动而又直接的办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真心诚意地把社会调查作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其次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能力”，采取群众所拥护的方法与手段。他通过实际的调查发现，只要那些“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并且能满足群众要求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把大多数群众动员到党的领导之下。相反，单纯靠背诵“党八股”的方法不但不能争取到广大的群众，反而适得其反。

“反对那种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

邓小平曾称赞张闻天“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以优良的作风和实际的行动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工作中的张闻天旗帜鲜明“反对那种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作风民主，谦逊和蔼，对具体问题常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平等地与大家商量，而且很耐心地听别人讲，没有一点架子。中联部原副部长赵毅敏回忆说：“对下面好的意见他都能采纳，不正确的意见则给予说明，使大家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思想上没有一点顾虑，说错，说对，都不用害怕。”最可贵的是张闻天从不争权，全心全意为党工作，遇到重大问题时，非常注意集中领导集体的智慧，经常征求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据档案记载，从1935年10月至1938年9月，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的就有286件，合作非常融洽。

张闻天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以自己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影响着身边的人。1933年3月，他在瑞金洋溪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亲自担任教员给学员讲课，用革命实际阐释马列主义的原则与方法。他的妻子刘英回忆说，张闻天就是一位文质彬彬、学识渊博的“红色教授”。1938年4月，他在受邀参加陕北公学讲演时，专门给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上了一堂《论青年的修养》的教育课，鼓励广大青年不但要有为实理想坚持奋斗到底的精神，也要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办学方针，创造了一种被学员们称为“照相”的学习方式，每隔一两个星期张闻天就把学员们集中在一起，把所学习的课程内容与当时国内国际现实结合，然后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请学员回答，这种自由活泼的“照相”既启发了思考，又培养了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代先声 垂教后世

——北京师范大学一二九纪念碑碑文敬读

□ 马伟宣 赵连稳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青年学生涌上街头，高呼抗日口号，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就此爆发。1985年12月，为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内建立起一二九运动纪念亭，亭内正面左侧中央矗立着一二九纪念碑。

纪念碑由碑座和碑身组成。青石碑座高0.3米，长2.74米，汉白玉碑身高1.6米，长2.5米。石碑的正上方刻有“时代先声”四个字，下面刻着碑名和碑文。碑文撰写于1984年，刻于1992年，记述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辉煌历史。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平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存亡到了严重关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师大学生冲破武装军警包围，最先到达新华门前，与其它学校队伍汇合，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军警镇压。十二月十六日，师大五百多名学生参加了更大规模的示威集会，阎世臣主持了在前门车站广场的市民大会。翌年一月三日，师大三十多人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并于二月一日在师大文学院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敖白枫首任队长。

在一二九运动中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有：杨秀峰、周小舟、林一山、王文彬、陈泽云等和江明。七七事变后，师大爱国师生奔赴各抗日根据地，投身于抗日战争，先后牺牲的有：张郁光、王文彬、张仁槐、蒋弼、郭庆云等，他们为国捐躯的悲壮事迹，永铭史册，垂教后世。

北京师范大学
一九八四年撰文
一九九二年勒碑

碑文叙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英勇事迹，并将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姓名镌刻到石碑上，以此来纪念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纪念他们“国自图强锋出爪，苍生万众尽兵军”的坚定信念；纪念他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赤子之心。

1935年的华北事变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的主要矛盾。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数千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希望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愿望。国民党北平当局命令警察打开水龙头向学生们的喷射，大批军警手持大刀、木棍等，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学生们毫不畏惧，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前仆后继，绝不退缩！从黎明到黄昏，百余人受伤，数十人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组织罢课，抗议反动当局的暴力镇压。12月16日，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学生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却遭到了更多军警的镇压，大批学生被砍伤，街道两侧血迹斑斑。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积极响应，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爱国学生自发举行请愿集会、游行活动，或通过发表宣言、通电等形式，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毛泽东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敬读碑文，我们敬佩先辈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青年学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力量。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军的咄咄逼人不断退让，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政府的态度而失望，为国土的沦陷而焦虑，他们振臂一呼，云集街头，为民族之图存而怒吼。在这场惊天动地的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走在前列，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先锋力量。他们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救亡宣传。在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北师大学生们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这当中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



的人物，如杨秀峰、林一山、周小舟等，他们将铁骨忠心亮于胸前，将热血头颅献给祖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世人所铭记！

中国共产党是青年运动的领航者。在整个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中，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毛泽东在回忆这场鼓舞人心的运动时曾说过：“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的发表给学生指明了斗争方向，使身处彷徨之中的爱国青年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的消息，使北平学生备受鼓舞。11月18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爱国学生有了统一的领导组织，使一二九运动“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运动爆发后，共产党多次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

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共中央在高度肯定一二九运动的同时，告诫学生们要认清当前的形势，单纯的学生运动是无法完成救国救民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的，若想彻底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就必须发动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参与到斗争当中。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爱国学生“把抗日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随后，平津学联响应党的号召，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沿途揭露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讲述华北的危机形势，并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之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扩大抗日宣传，散播革命火种，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红色秘密交通线：“中华苏维埃的血脉”

□ 连宏亮

周。周恩来要求集中3个月从各省调集精兵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交通线，打通连接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大动脉。在周恩来的秘密领导和直接指挥下，1931年3月，中央交通局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正式建立起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交通线，即“华南交通线”，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党的生命线”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主要负责接送来往中央领导、传递秘密文件和采购运送重要物资到中央苏区等任务。为保障上述工作在险恶环境中顺利完成，全体交通员创立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在交通线建立之初就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专门对秘密交通站的设立和运行进行了缜密安排。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工作的形式十分隐蔽，家庭、店铺、茶馆等都是其常用的掩护方式。传递情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用密写药水将文件写于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运送黄金、电台零件和药品等物资的方式也不一而足，交通员随身携带的低纸杆、裤带，甚至手里的甜瓜瓢，都是其藏金之处。

执行护送任务时，交通员一般是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分别行动，前面的交通员负责探路，查明是否有危

险，后面的交通员则与首长同行，保卫安全。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前者会及时发送事前约定的危险信号，后者则进行紧急隐蔽。除此之外，交通员还根据所护送领导干部的自身条件，将其化装成回乡的华侨或做生意的商人，甚至是牧师和算命先生以作掩护。整个漫长的交通线上，一般每隔10到40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少则一人多则五人的小站，交替掩护。站点之间单线联系，任务交接时，事前约定时间地点，力求准时交接。

此外，选拔交通员的高标准也是保障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安全畅通的关键。在所有要求中，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面临危险时，交通员必须保证信件、情报的绝对安全。其次，交通员要具备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能够广交各界朋友，懂得各行“行话”，对形势了如指掌。同时还能以各种合法的身份或职业作掩护，以免引起敌人察觉。在各方努力下，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真正成为了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长征前夕，通过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交通员安全护送了中央领导、情报人员以及妇女干部等共计200余人进出中央苏区，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博古、陈云、叶剑英等党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1月，博古、陈云二人动身离沪，先化装成商人前往汕头，再经邵阳、三洋坎到达大埔，之后昼伏夜出抵达闽西永定。当他们在一座废弃小煤窑休息时，突遇国民党

军队搜查，情急之下，交通员急中生智绕到另一个山头打了两枪，把敌人吸引了过去，这才保卫了二人的安全。最终到达瑞金后，陈云高兴地感叹道：“终于到家了！”

此外，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还是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信息传递的重要窗口。各种重要的信件、情报借此得以及时传递，显著改善了先前中央不了解地方实际、地方摸不清中央意图的状况。通过这条大动脉，紧缺药品、食盐、印刷品以及军械、无线电器材等物资陆续被运往中央苏区。尤其是大批食盐的送达，极大地改变了苏区军民之前用萝卜水、辣椒干等代替食盐煮菜的窘境，因缺盐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也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在打土豪时缴获的黄金、白银等也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输送到党中央。1931年，担任中央提款委员的陈刚到达湖南醴陵后，将收集的千余两黄金熔成金条捆在腰上，最终安全带回上海。赣东北苏区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在1931年、1932年两年时间内运往中央1000两黄金，1933年又给党中央送去黄金2箱、银洋18箱。这些经费的到来，有效地支援了党组织的发展。从1931年建立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逐渐停用，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和交通员在前后4年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和使命。毛泽东后来在评价这条秘密交通线时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